

目 录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1
第一编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1
第二编 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	31
第三编 汉唐间西域舞蹈艺术的东渐·····	107
第四编 汉唐间西域杂技艺术的东渐·····	224
有关丝路的文物资料附录·····	271
后记·····	276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279
一 海是联络友情的道路·····	279
二 向大海彼岸表达虔诚·····	293
三 艺术的风格永结友谊·····	306
四 “亲戚的生命”传播异香·····	313
五 珍宝与香料的舶来·····	323
六 珍禽与奇兽的贡献·····	332
七 武术与舞蹈的交融·····	338
八 装饰与饮食的传导·····	344
九 中日文学的互惠·····	354
十 中日绘画的齐芳·····	368

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	382
第一章 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 ·····	382
第二章 印度古代佛教艺术 ·····	403
第三章 印度中世纪印度教艺术 ·····	424
第四章 印度近代伊斯兰教艺术 ·····	441
第五章 东南亚诸国的艺术（上）·····	456
第六章 东南亚诸国的艺术（下）·····	471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①

第一编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一 由蚕丝的发明到丝绸之路的展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生产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在古代成为农牧业先进的国家，创造出辉煌的成果。我国灿烂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就，在世界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文化的传统，已经延续了五千年，经过历代的充实丰富，到今天更加绚烂多彩。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光大。我们的劳动人民是勤奋而勇敢的，在我们伟大而美丽的国土上，创造出许多奇迹。我们勤劳的祖先，用自己劳动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原始的辽阔大地改造成“锦绣河山”。用锦绣般的华贵美丽来形容我们祖国，从北方冰

① 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1年4月出版单行本。——编者（文集中凡编者加注都标明“编者”，以区别于作者原注。）

封的荒原到南沙热带的珊瑚岛，从西部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到东部沧波汹涌的大海疆土，正是贴切极了。但这个丰富多彩的用语，是从我国人民发明蚕丝产生出来的。

我国的劳动人民，最早在世界上发明了饲养家蚕（*bombyx mori*），用生产的蚕丝来织造丝绸，为西方世界所知，古代的西方人称中国为 *Seres*，意即丝国^①。丝国在东方，创造了自己的科学与艺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民独擅这种技术，对西方的国家，作出可贵的贡献，引起西方世界的热爱，他们不辞艰险地穿过沙漠雪山，跋涉远来；我们的人民，也同样地梯山航海，克服困难，向西方世界传播我们文明的成果。从汉唐时代的古都长安，达到安息（波斯、伊朗）、拂菻（东罗马、拜占庭），从无路的地方，踏出一条悠长的路来。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用坚毅的力量沿着这条路，不辞劳瘁地把中国丝织品运输到辽远的国度，辽远的人民中间去，这就是贯通欧亚的一条丝路的由来。这条运输中国的丝绸之路，通向西方世界，因此，古代就把沿途所经，统称之为西域；西域有国境以外和国境以内的区别。在汉唐时代，中国的西部疆土，都比现在的版图广远。唐代比之汉代的西疆更大，其西直到黑海边上，设有北庭都护府，管理军事行政，建立屯田制度，在西

① 据杨宪益说：“古代希腊罗马记载里又有 *Seres* 与 *Sinae* 二种族，其地在东方极远的地域，故一般西方学者亦以之为古代中国的名称。或以此二族本为一族，亦即相当于印度古代记载中的支那。……就其所记方向与距离看来，*Seres* 当即古代的蜀国，而 *Sinae* 当即古代的滇国。蜀国的蜀本为织丝的蚕的原字，此亦与 *Seres* 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见《零墨续笺》第2页。

疆发现的唐代文物，可以证明。在西部包括昭武九姓的领地，在唐代都属中国，设有羁縻州。如曹国、石国、安国等人民，皆尊奉唐帝国为天可汗，而自居于臣属地位，其各族人民，也有远来定居内地，长久同化的。

在西南海上的交通，也不断有商舶来往，载运珍贵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帛。因此在国境之外的西方邻国如印度、波斯以至埃及、罗马等地，中国古代也称之为西域。这些国家的人民，常向往于丝国的美丽富庶，沿着丝路往来；并且也因季候风凌着大海的波涛，到达广州和泉州，使西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技术文化，也向我国传播，彼此互相学习，和平交往，建立了永恒的友谊。从我国近年发现的文化遗物看，有汉唐时代的丝织品，古代波斯萨珊朝的银币，东罗马的金币，可知在文化上、商业上有频繁的交往。这条丝绸之路联系着辽远的西方。丝绸之路与万里长城，共同著闻世界，是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至今照耀史册。

关于我国古代蚕丝的发明与丝绸的织造，我国考古学者和东西方考古学者根据遗存的古物和古代文献的记载，作了不少可贵的研究。夏鼐在其《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①一文中说：我国古代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至迟在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殷代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距今已经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当时所遗留的甲骨文字中，有形似蚕、丝的象形文字，学者还不能确指就是桑蚕，但是在殷代，蚕丝生产的情况，却

① 见《考古》1972年第2期。

由考古学方面的遗物作证，得到明确的结论。在殷代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纹”，形象是“身屈曲蠕动若蚕”（见《商周彝器通考》）。在殷墓中发现的玉饰中，又有雕琢得形态逼肖的玉蚕。例如1953年安阳殷墓发现的玉蚕（《考古学报》1955年9期55页，图版拾柒，7），最近在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殷墓中也发现玉蚕^①。遗物“更重要的是一些由于粘附于铜器受到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研究，其中有的是采用高级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绮）和绚丽的刺绣。例如1950年出土的安阳殷墓铜戈上有细绢^②，根据这些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殷代丝织技术的成熟程度而言，在它以前应该有一段发展过程。”^③按之原始社会，在生产知识上实践经验的积累，相当缓慢，必须经过劳动人民长时期的观察改进，才能逐渐成功。这个养蚕织丝的技术，可能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达到这个程度。它的悠久的实践过程，经过长时期的劳动人民的积累认识而完成，这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殷代以前，是无文字的历史时期，只有神话和传说，往往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成就，归功于某一个历史传说中的代表人物，关于“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传说，归之于黄帝元妃嫫祖西陵氏，也不过是这种传说的依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育蚕治丝这一个伟大的创造发明，必然是无数世代的劳

① 作者旧藏玉蚕二、金蚕一，出土地不明，但其形态是毕肖的。

② 见《考古学报》1951年5期，第19页。《殷代丝绸和刺绣的研究》，见《远东博物馆馆刊》第9期，1937年英文版，第119—126页。

③ 见《考古》1972年第2期。

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所创造的。这就给殷代以后二千年的汉代通向西域，为丝路的展开莫下了基础。

现在从殷代有文字的历史时期算起，中国育蚕织绸的历史，也已经有了三千六百多年。殷代的丝绸实物，据考古学者的分析研究，已相当进步成熟。它的主要织法，有（1）普通的平纹组织、（2）畦纹的平纹组织和（3）文绮等三种。殷代的刺绣实物也有发现，花纹作菱形纹和折角波浪纹。到周代的织丝技术，有更进步的发展。在《大盂鼎》和《毛公鼎》的铭文中“𦐇”字，郭沫若氏以为是“经”字的初文，“象织机之纵线形”（见《金文编》1959年版第580页），是竖机的一种。在周代的文献中，如《尚书·禹贡》，提到当时生产蚕丝和丝织品的地区；《诗经》、《左传》、《仪礼》等书中有很多地方，也提到蚕、桑和丝织品。丝绸已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要衣着原料。《论语》中曾提到过去的礼制，以麻为冕，这时已改用纯丝制成。传说的“孟母断机”和“墨翟悲丝”，都与丝织工艺有关^①。当时的丝织物，有罗、纨、绮、郤、锦、绣等，特别是在东周时或西周末出现了“锦”字，《诗经·小雅·巷伯》有“贝锦”，汉郑玄注说：“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周锦正是汉锦的前趋。当时的劳动女工，使用不同彩色的丝线去织锦，需要用先进的织丝技术和进步的织机工具，织成后花样新颖，藻采灿烂，所以被视为一种高贵的工艺品。以前送礼常用

^① 《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简。”孟轲辍学，孟母断机教戒。墨翟见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五入则为五色，所染各异，因而悲叹。这都是有关染织丝绸工艺的传说。

普通的丝绸叫“束帛”，到东周时统治阶级中的赠礼常改用“束锦”。《左传》有“衣必文绣”的记载。到战国时“锦”“绣”二字常常连用以代表美丽光华的织物，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也就是从我们精巧的织工手中开始得到这种华美的形容的。

东周时代的丝织品，在解放以来，曾在好几处楚墓中发现过。(1) 1957 年发掘的河南信阳楚墓中，据出土物图录，有菱形文绮和方目纱（见《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1959 年〕图 170—175）。(2) 1965 年发掘的湖北江陵望山的两座楚墓，一号墓有“提花丝帛”和“绫”，二号墓有刺绣、木俑的绢衣和丝质假发（见《文物》1966 年 5 期第 33—39 页图 8〔提花丝帛〕、图 11〔刺绣〕）。(3) 湖南长沙楚墓，解放前曾出过“缙书”、“帛画”和其他丝织物（见《楚文物展览图录》〔1954 年〕图 12、20、21；《湖南省文物图录》〔1964 年〕图 57—58）。上述外，更有几批重要的发现：1952 年五里牌 406 号墓，出土有残绢片（其中一片上有绣花）、文绮（褐紫色，有菱形花纹）、丝带（一件紫褐色地，有菱形花纹和犬齿纹，宽 1.4 厘米；一件用黑褐二色丝织成，褐地，有黑斑节纹，宽 1 厘米）、丝织网络（罗？）、丝绵被（见《楚文物展览图录》〔1954 年〕图 45—48）。1954 年左家公山 15 号墓和杨家湾 6 号墓，都出有残丝绸，前者又出丝绳（见《文物》1954 年 12 期，第 7—8 页，20、45 页；《考古学报》1957 年 1 期，第 93—101 页）。1956 年广济桥 5 号墓出丝绳（捆缚棺脰）、平纹绢（作成圆形袋）、菱形花纹丝带（二件）和“织锦”，最后一件据图片和文字说明，是一件用“提花”方法织成的“内夹小

花的两层菱形纹”的文绮，并不是彩色的织锦。1958年烈士陵园3号墓出有刺绣（见《湖南省文物图录》〔1964年〕图版53—56页；其中广济桥5号墓简报，见《文物》1957年2期，第59—63页），1971年浏城桥楚墓出土有丝织品（见《光明日报》1971年11月16日）。这些资料都是近年发现的。周代开始有了罗纱组织。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周代玉刀，上面残留有这种组织的罗纱残片。这是当时丝织工艺的又一进步。而且周代的丝织品，在当时业已传播到辽远的地方。在今苏联阿尔泰区的巴泽雷克的几座古墓中，曾出土了中国丝绸，有以彩色丝线绣出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的刺绣和由红绿二色纬线织出的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这些墓葬属于公元前五世纪，即相当于我国的战国初期（见《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7—39页，图1—2，图版壹，1）。这可以说明，中国的丝绸在汉代从丝路向西方传播之前，已先到过了北方的阿尔泰部落之间，为当地民族所宝贵。

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秦汉统一了全国的疆土，更加促进了封建经济进一步繁荣。因此我国古代的丝绸生产工艺，在当时手工业工人的努力下，研究求进，生产实践大大提高，更超越了前代，达到一个高峰，并作为贵重的商品和政治交往的贵重礼品，向西方世界流通。丝路通向遥远的西部边疆以外，自汉代就有记载，有可能从汉以前就已开始。

汉代的丝织品，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很多。在我国的中原和西部国疆，都保存着当时的实物。汉代由于桑蚕饲料的改善，

“地桑”（鲁桑）培植的成功，提高了蚕丝的质量，加以织机的改善与色彩的多样，生产多而且美，因此它才能作为商品，向西方传播，得到世界上很高的评价。我国的手工业工人，为祖国赢得了长期的荣誉，不是偶然的。

汉代总称丝织物为“帛”、为“缯”，或合称“缯帛”，汉许慎《说文》卷十三上“缯，帛也”；卷七下“帛，缯也。”《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他们“皆贪汉缯帛”。又有缟、素、纨、素等名称，后世谓之绢，即平纹组织的普通品。高级的细绢叫做“冰纨”，较普通素绢细密的叫做“缣”。汉乐府《上山采蘼芜》诗有“将缣来比素”语，以明织缣比织素较慢。敦煌曾发现“任城缣”残帛，有汉文题记：“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见《流沙坠简》，1914年版，卷二，43页；斯坦因《塞林提亚》，1921年英文版，第701—704页）。汉代的丝织品中还有罗纱。更出现了罗纱组织的提花罗纱，是从周代发现的罗纱组织进一步发展，为过去所无。汉初以“锦、绣、绮、绡、绠、罽”为高级织物，不许商贾穿着（见《汉书·高祖纪下》），其中前四种，都是丝织品。刺绣比锦更贵，因为它是用精巧的手工制成的。这些是仅供封建上层使用的贵物，虽以商贾之富，也不许染指。汉代刺绣的实物，在怀安、武威、罗布淖尔和诺音乌拉、帕尔米拉等处，都有发现。1968年在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又有发现（见《满城汉墓的刺绣》，《考古》1972年第1期）。特别是近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从1972年1月中旬开始，到4月底结束，发掘出大批西汉初期的丝织品，而且保存完好，色泽鲜丽，为古代丝织品保存了最好的标本。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说：“丝织品

包括完整的服饰，整幅或不成幅的丝帛，以及其它杂用织物。出土数量大，品种多，花纹鲜艳繁缛，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次非常重要的大发现。”

这些丝织品一部分用作帷幔悬挂在北“边箱”的四壁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图版拾陆，1），一部分用于内棺中的裹尸和覆盖，一部分用于包装器物，而大量的主要的丝织物，是出于竹筒内。粗略统计，衣著、袜鞋、手套等服饰在四十件以上，杂用织物约二十件，整幅和不成幅的丝织物约五十多件。

这次出土的丝织品，包括了目前所了解的汉代丝织物的大部分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绮等等。丝织品的颜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的制作技术有织、绣、绘等，纹样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等（同上，图版肆；图版伍）；服饰类有绛绢裙、素绢裙、素纱禅衣、素绢丝绵袍、朱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同上，图版贰肆）、黄地素缘绣花袍、泥金银彩绘罗纱绵袍（同上，图版陆，3）、泥银黄地纱袍、彩绘朱地纱袍、素罗丝绵袍、素菱纹罗袍、红菱纹罗绣花袍、绣花手套（同上，图版陆，2）、素罗手套、朱罗手套、素绢袜、丝鞋（同上，图版陆，4）、丝头巾等；杂用类丝织物有锦绣枕、绣花香囊（同上，图版拾捌，2）、绣绮香囊、绣罗锦底香囊、朱墨彩绘纱带、绣绢包袱、素丝包袱，等等。其中纱料质轻而薄，犹如现在的尼龙纱。例如一件素纱禅衣，衣长一二八厘米，袖通长一九〇厘米，重量仅四九克（同上，图版陆，1）；另一块纱料，幅宽四九厘米，长四五厘米，重仅二·八克。

最珍贵的是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帛画（同上，图版壹）。

画幅全长二〇五厘米，上部宽九二厘米，下部宽四七·七厘米，四角缀有飘带，形似长衣，学者名之为“非衣”，也就是飘然飞去，祝死者羽化登仙的意思。也有人名之为旌幡（过去在河北怀来五鹿充宗墓内也发现过这一类的旌幡，出土已毁）。其上图像，绘的是天界、人界、冥界各景象，线条流畅，描绘精细，在彩色处理上，使用了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对比强烈，色彩绚烂。帛画的内容丰富，其内容可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天界有日、月、交龙，日轮中的金乌，有高度写实的技巧。日轮下为神话中的扶桑，排列九日，居于上枝下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另一边的新月，中有蟾兔，是汉诗中“四五蟾兔缺”的具体表现。在月下绘出逝者亡灵，如神话中“嫦娥奔月”般腾空向月宫飞去。这是汉初迷信思想之一。其中绘有人首蛇身的图像，这是中国传说中的始祖神伏羲女娲，为汉石刻中常见，以保护死者的亡灵，所保护的就是两个对坐的主人。中部人界，绘墓中女主人的生前行状，宴飨进食，极尽奢侈享受。下部冥界为侏儒力士，以双手托举大地，这也就是《庄子》中“雄伯之国有大人”的传说，描绘出他有无穷的力量。这幅画的美术价值，当在美术史中作特殊的研究。这里只谈汉初以帛作画的惊人技巧。从墓葬中的物品看，单是丝织一项，就不知靡费多少劳动人民的精力和工艺美术工作者的经营构想。据考古学者的初步考查，这是西汉惠帝到文帝时（公元前194—前157年）长沙相利仓（黎朱苍）进封愍侯家属的墓葬。与之相并的两墓，最近又复发掘出土用帛书写的《老子》和其他古代已佚失的《法经》等宝物，又发现一件相类的

“非衣”帛画，丝织品已应用书和画的大幅作品^①。从这几个西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到当时封建阶级的上层人物，享用服饰，如何骄奢。而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如何深重。单就一号墓发现的四十件以上的服饰，二十件杂用织物，和五十多件整幅和不成幅的丝织物，就为西汉初年的丝织工艺美术作了绝好的样品。它为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所享用，也为当时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社会上层所爱重，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甚至不惜重金远求购买。由于我国手工艺工人的创造成就，因而我国便被西方人称为“丝国”。这一横贯亚洲大陆运输丝绸的商业往来通道，就被历史上称为“丝路”，即“丝绸之路”。正如夏鼐同志所说：“我们只有充分了解我国古代丝绸生产所达到的技术水平，才能认识当时我国丝绸在世界的影响，也才能认识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②

二 由中国内部斗争的长城 到国际文化交往的丝路

中国古代有两大著名史迹，一是蜿蜒中国内部的长城，二是通往西方国际的丝路，都闻名于世界。长城是战争的掩体，在六国时，中国处于分裂状况下，常有内部战争，为了防御骑兵的突然袭击，齐、楚、魏、赵、燕等地，都各筑有长城。齐的长城，从平阴附近开始，向东南走，达到琅玕。楚的长城叫

① 见《文物》1974年第10期。

② 本节仅撮述我国从商代到汉代一千多年的丝织品，在考古学上发现的实物资料，至其织丝技术与织机的逐步改进，养蚕育桑的逐步改良，前引论著有详细的研究，可参看《考古》1972年第2期。

做方城，从泌阳到竹山，以扼伏牛山脉的东端。魏的长城，一是包括着大梁（开封），跨过黄河两岸；二是从潼关之西，经鄆州以及固阳（包头之北）。赵的长城沿着漳河；燕的长城沿着易水。这些长城的古代遗址，至今还有残存。到秦统一六国，建成封建大帝国，长城建筑工程，也更加伟大。它的发生和发展，与防御我国内部少数民族匈奴族的奴隶主的掠夺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根据历史，略作探讨。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史前期，它是分散的，不团结的，各民族之间，时常发生斗争。匈奴族是中国古代民族之一，居住在中国北方疆土上。他们是夏民族的后裔，与殷、周并为古代中国三个较强大的氏族集团，其中各包含着不少较小的部落，组成强大的力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所有制社会，从夏、殷到周代的春秋时，都还在奴隶制时代。从周代的战国时，开始了封建制。但夏民族的后裔匈奴族，直到公元前三世纪，还是部落分立的奴隶制社会，主要生产是畜牧，由于他们的活动地区是多沙漠的蒙古高原，水草的分布很不平均，决定了他们必须采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由于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农业和手工业也就缺乏发展的条件^①，使社会性质停滞不能前进。但是由于牲畜的繁殖和由牲畜身上分出的其他生活资料，使荒漠上的牧人，有了消费之外的剩余，这就有了私有财产的萌芽，因之使匈奴族内部开始了贫富的分化。畜群的繁殖很快，占有较大畜群的家族，要求更多的人力来照管牲畜，于是在和其他部族冲突斗争时，开始把被打败的人俘

^① 参看纪庸编著《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第1章，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

虏为奴隶。使用奴隶，使某些家族的财富，增加的速度更快，因而成为奴隶主阶级；最强大的奴隶主更发展成部落的首领，他的家族也成为有特权的贵族，拥有更多的奴隶；其他的部落成员，也在战争中分得相当数量的奴隶，因此奴隶就成为匈奴族上层的财富。他们四出掳掠，平时都练习骑射，组成了行动飘忽、如鸟之集、往来迅速而便捷的骑兵团，不断从邻近地区，俘获人口，掠夺财物，作为他们的胜利品。用俘虏作奴隶，给他们放牧和生产手工业品，后来也掠取汉族农业人口，为他们在土地肥沃的地方耕种少量的田地。这便是古代匈奴族社会简单的情况。

夏族的后裔匈奴，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比之商和周是落后的。商代由于长期的文化累积，有了甲骨文留存下来，商、周两代并且有了铜器的铭文和史书（《尚书》），记述了这一时代的情况。只有夏民族的历史，传说而难实证。从其所居住过的内蒙以至宁夏、甘肃地带发现的古代遗物，可以窥见它的原始文化状态。到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掇拾旧闻，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叙述。特别是关于散处大漠的匈奴史迹，有了较详的文字记录。《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从这一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知道匈奴的古代社会情况，它原是中国古代北疆原

有的民族之一，名叫淳维。在商、周、秦、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或叫猃狁，或叫荤粥，到汉代叫匈奴，都是一音的转变。资产阶级学者麦高文在他的《中亚古国史》第四章中，虽则惑疑夏代后裔这一记载的可靠性，但他不能否认历代中国民族向边地播迁的史实，从周、秦、汉、魏、南北朝，……中国不少分散的民族，逐步吸收汉文化，融合为一体，匈奴族也是其中合成分子之一，这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任何一个国家，很少是单一民族的，民族的形成，常包含着许多氏族部落，民族的斗争，归根结蒂还是阶级斗争。匈奴族内，包含着不少部落和部族，正如斯大林所说：“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① 在商周时代，当时社会还处在奴隶所有制阶段，所发生的战争，是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夺取奴隶与财富的战争，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时，匈奴奴隶主曾与殷王武丁，在包头一带发生过战斗，甲骨文中记有鬼方与土方，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时，殷王武乙在位，周王季历附属于殷，曾与鬼方战斗，周人俘获了不少鬼方的部族头目，“击鬼戎，俘二十翟王”，见于《竹书纪年》的记载。到公元前十一世纪时，周康王、懿王、成王都和鬼戎猃狁发生过斗争，见于“小孟鼎”的铭文。在《逸周书》的《汤四方献令》中，与匈奴还有过合作的记载。当商代和周代的前期，都还是奴隶所有制的社会，为了这些奴隶主的利害关系，时战时和，原是不足为异的。而周人来自西北，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才南迁岐下，他的祖先与匈奴也有密切关系。至于所

① 见《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 页。

谓“鬼方”也写作“𪚩”或“魑”的字形，就是后来汉族中隗氏的起源，与淳维仍是一音之转。方不过是表示地方或部族，大概在国家尚未形成以前，已经有这样的称谓了。

当战国以后，中国社会，主要地区已经由奴隶所有制转入封建制，但在边地的匈奴游牧部落，仍停滞在落后的奴隶所有制状态，常常为了掠取奴隶，向邻近的人民进攻。大大小小的斗争，不知其数。到秦建立了封建大帝国，统一六国，势力强大。当时匈奴单于叫头曼，与秦斗不能胜，向北迁徙。头曼的儿子叫冒顿，杀其父头曼，勇敢能战，击破了东方的东胡，又击走了西方的月氏，虏其人民及畜产；又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势力大盛。常常威吓要南下牧马，掠取人民，作为奴隶。因此燕、代等地，都因山险，建立了城垒，作为战争时的掩体。长城是中国内部斗争时所建造的战争工具，作为保卫生命财产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的学者把它说成是国家的疆界，这是无知或别有用心。

到西汉封建大帝国建立之初，统治者把匈奴族作为国内的兄弟民族，采取了和亲的政策，希望保持和平，发展生产。但匈奴族中的大小奴隶主们，虽收取了汉馈赠的大量的金锦，却屡屡破坏和约，进行掠夺财富和人民，与汉帝国的封建主不能协调，仍施行其奴隶主的掠夺手段。《史记·匈奴列传》说：“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掠得的奴隶牲口更多，冒顿单于的势力更加扩大，阻塞了向西方的通路，匈奴和汉的斗争，也更加频繁激烈。匈奴的奴隶主们，掠夺了资财，归于自己，